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汤志钧
编

梁启超卷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汤志钧
编

梁启超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梁启超卷/汤志钧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300-20301-0

I. ①中… II. ①汤…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梁启超 (1873~1929)—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2777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梁启超卷

汤志钧 编

Liang Qichao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32.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19 000	定 价	7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梁启超的一生^{*}

——代引言

新会位于珠江三角洲，在广州西南，离澳门很近。1873年2月23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梁启超生于新会凤山之麓的茶坑村。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祖父是举人，父亲是庠生，母亲也知书识礼。他从小聪明好学，深受祖父、父母的钟爱，也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除四书五经外，特别喜欢历史书，将家中仅有的《史记》、《纲鉴易知录》反复阅读，“《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

明清以来，推行科举考试，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就考取了举人，他的试卷，深受主考官李端棻的赏识，李端棻还把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

1890年，十八岁的梁启超在广州学海堂肄业。学海堂是嘉庆年间阮元担任两广总督时创设的广东最高学府，他主编的《皇清经解》，就被称为《学海堂经解》。堂内藏书丰富，梁启超遂得左图右史，博览群书。

这时，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略中国，1885年中法战后，法国侵入中国西南边陲，民族危机严重，康有为于1888年12月10日上书请求变法，指出帝俄蚕食东方的阴谋和法国专力越南以窥中国的企图，要抵御外敌，就必须“内修政事”；要“内修政事”，就必须变更成法。应该“酌古今之宜，求事理之实”，“讲求变法之宜”。这次上书，光绪皇帝没有看到，康有为却声名大著。他回到广州，在安徽会馆晤见了廖平，受其启发，觉察今文经学讲求“变”，正可援以论政，因为以孔子为代表

^{*} 本文见编者所著《梁启超其人其书》，304～32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的儒家经学几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尊颂，不如利用人们对孔子的迷信，进行改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①

康有为回到广州后，移居广州云衢书屋。在学海堂肄业的高才生陈千秋听到康有为的声名，前往谒见，大为钦佩。1890年秋，陈千秋告诉梁启超：康有为的学问，“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梁启超随同陈千秋进见康有为时，康有为“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对中国数百年来没有用的旧学，一层层驳斥，举出事例，摧陷廓清，梁启超闻所未闻，大为感服，自称：“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甚至“竟夕不能寐”^②。于是“北面执弟子礼”。自此以后，追随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的宣传鼓动。

康有为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传统的塾师课艺完全不同，梁启超“执弟子礼”后，也感到旧的为了应付科举考试的塾师诵读，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必须改变学制，废除科举。要振兴中华，必须培养人才；要培养人才，又必须有新的学校。

二

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国惨败。次年4月17日（三月二十三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瓜分危机迫在眼前，康有为趁着入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应试举人联名上书请愿。接着，又在北京、上海设立强学会，创刊《万国公报》、《中外纪闻》。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梁启超积极参加，并于1896年8月9日，主持上海《时务报》笔政，宣传维新，鼓吹变法。

“维新”，是“维”资本主义之“新”，“改”封建主义之“旧”。要“维”资本主义之“新”，就要学习西方，讲求西学。早在1890年，梁启超入京会试返回广东经过上海时，就购买了《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③。在广州，康有为也讲过“西学之梗概，自是决意舍去旧学”，梁启超看的翻译本西书

①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267页。

②③ 梁启超：《三十自述》。

也就多了。等到主持《时务报》，还写了《西学书目表》，说日本之所以“翻然而悟，奋然而兴”，是由于“既受俄、德、美劫盟之辱，乃忍耻变法，尽取西人之所学而为之，遂有今日”^①。

然而，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效西法三十年矣”，却“效之愈久，而去之愈远”，又是为什么？这就不能不引起梁启超的深思。

学习西方，就离不开学校，就不能不改革科举弊政，梁启超在《时务报》连载的《变法通议》中，以较多的篇幅专门写《论学校》，包括《论学校总论》、《科举》、《学会》、《师范学校》、《幼学》、《女学》、《译书》多篇，从《时务报》第五册起，一直连载到第三十六册。

洋务运动时期，也设过学院、学校，也有过同文馆、广方言馆等机构教习西文，也出版过一些翻译本西书，为什么三十年来还是遭受外国的欺侮？为什么西方的工艺不能给衰朽的封建制度催生资本主义，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呢？梁启超认为：“所译之书不尽可用，所用之人不尽有才，所引进的技术又有早为西方吐弃不足道者”，不能什么都学，什么都要，应该“译西方有用之书”，“用西方有用之才”。聘用西人也应聘用专门人才，而不是不学无术之人。至于翻译，也不是仅识“外国之语言”或“稍涉范篱”的人所能胜任。如果译书之人“仅识文字”，自然不能“达意寻旨”。京师译署等虽已译书数百种，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鄙夷而讪笑”。他又认为，要译西方最新之书，而不是“二十年之旧籍”。西方各国也是经历多年才形成一些成果的，他们又不断更新，日新月异，因而只有学习西方最新之书，才能缩短实现近代化的时间进程。

梁启超还说：学习西方，还得注意中国国情。他说：“居今日之天下”，而要参照西法以救中国，不是只懂得西方文字或入籍西方就可以从事的，必须要熟悉中国的经、史，明了中国的律法，懂得天下群国的利害，以及本国所以治理天下的道理，才能得到立法的来源，改革的原因，再考察中国古往今来政治的不同“而会通之，以求其可行”，这才叫做“真知”。^②事实上，西方各国也有西方各国的地区特点和民族传统。“学习西方”，一方面，要摄取其中的营养，用以发展自身；另一方面，又不能生搬硬套，全盘西化。

①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学校》，载《时务报》第二十七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1897年5月22日）出版。

② 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

《时务报》影响大，销路广，它虽在上海租界发行，但总会受到当局的干预，梁启超和《时务报》经理汪康年又有矛盾，汪康年还受到张之洞的胁迫。这样，梁启超就想到离自己家乡很近而清政府难以控制的澳门办报。1896年冬，他到了澳门，在华商何穗田的支持下，筹集资金，开办《广时务报》，以“开风气，广见闻”。定名为《广时务报》，表示“推广”《时务报》和广东的《时务报》之意。以为《时务报》“不臧否人物”，对“京师及各省近事，有耳闻目见，不容已于言者”，也“抉择多载”。《〈广时务报〉启启》刊登后，汪康年的友僚很有意见，对梁启超“兼领澳报”也有看法：有的说“卓如在澳门大有阴谋”，有的说“不宜与《时务报》相连”。由于澳门报纸主持笔政和写稿的，除梁启超外，何树龄（易一）、韩文举、欧榭甲、徐勤、曹泰，都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弟子，汪康年“畏祸”，反对“《广时务报》”的名称，终于把报名改为《知新报》。

1897年2月22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知新报》在澳门创刊，梁启超写了《叙例》，说明分为“论说”、“上谕”、“近事”、“译录西国政事表”、“译录西国农学、矿政、商务、工艺、格致等报”诸栏。发表了《说群》、《说动》等论文多篇，《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也在《知新报》第五十五册刊出，痛陈“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人不自保”，都是因为人才乏绝，无以御侮之故。为什么人才乏绝，又都是由于“科举不变致之”。科举取士，不能取得人才，而层层考试，又使学子思想束缚，不明国事，“当时局危急如此，而天下之士为无用之学如彼，岂不可为大忧哉！”他代表应试举人，上书皇帝：“国事危急，由于科举乏才。”

百日维新时期，梁启超还代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今录“学堂功课例”第一节如下：

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盖由两者之学未能贯通，故偶涉西事之人，辄鄙中学为无用。各省学堂，既以洋务为主义，即以中学为具文。其所聘中文教习，多属学究帖括之流；其所定中文功课，不过循例啾唔之事。故学生之视此学，亦同赘疣。义理之学，全不讲究；经史掌故，未尝厝心。……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且既不讲义理，绝无根柢，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只增习气。……今力矫流弊，标举两义；一曰中西

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宜昌明此意，颁示各省。

这些是针对洋务运动时期办学的弊端而厘定的。他还在百日维新时期，草拟过《译书局章程》。

由于《知新报》在海外发行，每能登载内地报刊不敢登、没有登的文章和报道，如《保国会演说辞》：“启超窃谓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对当时士大夫的“消遣岁月，甘为游民”严加痛责，这些，内地报刊是不敢登的。

值得注意的是，政变以后，内地宣传维新的报刊先后停办，只有《知新报》仍旧继续发行，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相互呼应，同为指责慈禧、批评清政府的重要刊物。

梁启超的文字通俗易懂，言论激昂慷慨，说理深入浅出，当时“新学士子”怵于民族危机的严重，看到他“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梁启超的声名大著，《时务报》在他主笔政时，影响日广，数月之间，销行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此后，《知新报》也风行海外，传入内地。这使他感到，要宣传变法，要开发民智，报章的影响，比学校教育更加广泛、深远。

三

维新百日，变法失败，梁启超仍旧追随康有为，展开“勤王求救”。光绪死后，他又鼓吹立宪。在这十多年中，他没有放弃报章宣传，也没有忘记教育鼓动。

1898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流亡日本，首先考虑重建宣传阵地。12月23日（十一月十一日）在横滨发刊《清议报》旬刊。在《〈清议报〉叙例》中，说明要以之“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所列四条宗旨的第一条是“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第二条是“增长支那人之学识”。自己远在海外，只有利用报刊教育国人了。

《清议报》最初几册的论文，着重对发生不久的政变予以述评，如《论八月之变乃变立而非训政》（第一册）、《上舍位忘身而变法》（第二

册)、《政变原因答客难》(第四册)、《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第四册)等。第六册以后,侧重正面阐发其政治主张。《戊戌政变记》也在该报陆续刊布。

《清议报》的主旨是“尊皇”。梁启超认为:“中国之能力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皇上之有权无权”。“但使皇上有复位之一日,按次第以变法令行禁止,一二年间,积弊可以尽去,一切美政可以尽行。”还幻想“借友邦之力以抵制之”。从而集矢攻击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说是当前“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①。着力宣传“尊皇”,以光绪皇帝为自古以来未有的圣人,认为中国的安危存亡都系于光绪一身。他专门写了《光绪圣德记》,说他是“舍位忘身而变法”、“爱民忘位”的“圣君”。在社论中也是同样论调,如说:“今日之变,为数千年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②

《清议报》“日日言尊皇”,也深刻指出当时民族危机的严重。认为“东西之国”之所以“淳然日兴”,中国之所以日益危机,是因为他们的国民,“以国为己之国,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而“我之国民,以国为君相之国,其事其权,其荣其耻,皆视为度外之事”。民国,本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如果“人人不自有其国”,那是很危险的。

这些言论,比政变以前更加激切,梁启超当时又以“维新志士”流亡海外,所以《清议报》传布很广,在舆论界起过影响。

梁启超在鼓吹“勤王”、“保皇”的同时,也注意到兴设学校。

还在维新运动急剧展开时,维新志士就于1898年3月在横滨开设了大同学校,康有为的弟子徐勤为总教习,“中文、西文、东文三者并进”。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大同学校“创一志学会,将以尊其所闻,学其所志,集寰宇之知识,拯宗国之危阨”。他特地写了《大同志学会序》,以为“志”是学的基础,“智”又是“志”的基础。人不可以无“志”,而“志”的大小,每“因其智之大小以为差”。“知道学习的可贵,然后求学的志向产生了。知道有京师,然后到京师的志向产生了。知道有天下,然后救天下的志向产生了。知识越扩充,志向也就越浩

^{①②} 《尊皇论》,载《清议报》第一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98年12月23日)出版。

广；知识越真确，志向也就越坚定。听说这里学生都以古人作为自己的榜样，希望您们既有其言，也有其志。”

接着，梁启超对“立志”又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求所以扩充其志”，一是“求所以实副其志”。怎样能做到这两点？那就是好求学，不学不能增加“智”，不“智”不能坚定“志”，如今“国家之病，殆入膏肓”，内忧外患，危机日深，应该随时关心，“勉求扩充其知，真确其所知”。“志”是不可夺的，“知”是要“先立乎其大者”的。

梁启超以为变法虽然失败，但“新法他日在所必行”，准备“合各同志，悉心研究”，又借大同学校召开政治学会，他作了“中国必先开议院，乃可变法”的演说。说是“议院不可开，地方议会可速开”^①。

1899年4月，梁启超又来到神户，与华侨麦少彭商议华侨教育，设立神户华侨同文学校，聘日本文部前大臣犬养毅为名誉校长。5月24日，神户华侨同文学校举办“梁启超先生的欢迎会”，梁启超很激烈地讲述了祖国衰落的原因，并作为结论说了以下的话：

所谓一国的舆论，是看其国民有无国家的观念而论，日本国民只不过是中国的十分之一，但能打胜中国，这是日本国民能牺牲生命为国尽忠，但是，我国的国民大多是重视个人的利益，而以营利为重而不顾国家，这原因就是我国和日本国的教育大有不同之故。所以华侨应该重视教育，现在横滨华侨也已设立了教育华侨的学校，校名为“大同学校”，所以神户华侨也有必要设立华侨的学校。

据记载，梁启超这一番演讲，感动了听众，华商麦少彭等热烈支持建立华侨同文学校。

该校章程第一条“立学总议”称：“本校专为教神户华侨子弟及中国内地有志游学之士而设。”这所学校在梁启超离开日本后，一直坚持办学。1984年，我到神户访问，还特地参观了神户中华同文学校^②。

梁启超是关心教育的，即使流亡海外，还注意对旅日华侨子弟的教育，教他们“立志”、爱国。

然而，旅日华侨子弟毕竟不多，他们对国内的了解也远不如国内同

① 《记政治学会开会事》，载《清议报》第二十七册，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1899年9月15日）出版。

② 1939年，神户华侨同文学校与神阪中华公学合并，正式命名为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胞，这样，对国内同胞以至青少年进行教育、介绍世界情况、鼓励立志爱国，还得依靠报纸宣传。

四

1901年12月21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清议报》第一百册出版，梁启超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总结《清议报》的特色：一是倡民权，二是衍哲理，三是明朝局，四是厉国耻，“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希望《清议报》能使“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

就在这一册出版后的第二天，清议报社失火，《清议报》也宣告停刊。1902年2月8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梁启超另在日本横浜续创《新民丛报》，每月旧历初一日、十五日发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起，改为每月十四日、二十九日发行，历时六年。1904年2月以后，经常不能按期出版。共出九十六号。编辑兼发行人署冯紫珊，实为梁启超负责。刊物中重要文章，大都出自梁氏手笔。

创刊号在章程中提出三条：一是“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二是“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三是“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续发表《饮冰室自由书》，自创刊号起，一直登到1905年4月出版的第六十七号，《叙言》中称：“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饮冰室自由书》后来还汇成单行本出版。

《新民丛报》自第一号起还连续刊载梁启超的《新民说》，凡二十节，即叙论、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释新民主主义、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论公理、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自尊、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毅力、论义务思想、论尚武、论私德、论民气、论政治能力。一直登到1906年1月6日出版的第七十二号，历时五年，后又出版单行本。

什么叫做“新民”？他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也就是说：旧有的应创新，本无的应采补。处于当时各国竞争的时代，要救国图强，就不能保守，而应进取，吸收各国之长，“以补我之所未及”。中国文化灿烂，开化在希腊、罗马之前，汉、唐、元、明的文治武功，欧美各国都加称道。只因近今日渐衰退，“优胜劣败”，国民被外人称为“东亚病夫”。应该“观彼族之所以衰所以弱，此族之所以兴所以强，而一自省焉”。

接着，他从公德、权利、自由、自治、自尊、合群等各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在旧传统的束缚下，国民品格存有亟待提高的问题，如“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益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等等，要在新时代立足，必须与传统道德观念“奋起抗争”。

《新民丛报》自1902年2月8日创刊，到1907年11月20日出版第九十六号后停刊，历时七年。在这七年中，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同盟会的成立，武装起义的展开，革命报刊的出版，清政府的预备立宪，等等。在这风云变幻的社会中，梁启超的文章，有时拉车向前，随潮流而上，有时也会不适应形势甚至逆时代而动。这样，对梁启超和《新民丛报》的评价，也就并不一致。我认为，《新民丛报》和革命派的机关报《民报》有过争论，梁启超也确曾写了一些与当时形势不相适应的文章。但学术讨论中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评价人物，不能“阿其所好”，“为贤者讳”，也不能一笔抹杀，不计其余，应该实事求是，具体分析。这里不发挥私见，只想提下列几点参考意见。

第一，《饮冰室自由书》、《新民说》的社会影响不能低估。

第二，《新民丛报》自创刊号起，就在“学说”栏着力介绍西方学说，如《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二大家”，指培根、笛卡尔，第一、二号）、《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第三号）、《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第四、五号）、《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第十一、十二号），“广罗政学理论”，对开发“智育之本原”，无疑是有益的。

第三，梁启超受康有为的思想影响，人们以“康、梁”并称，但他们的思想也不完全一致，否则康有为就不会叫他“流质善变”。当他主编《清议报》时，屡屡登载康有为的诗文，连康氏早年的哲学著作都加登载。《新民丛报》则不然，举例来说，1902年春，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